

黃俊傑編譯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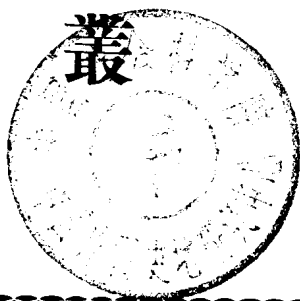
增訂
三版

史學方法論叢

黃俊傑編譯

增訂
三版

史學方法論叢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增訂 史學方法論叢（全一冊）

編譯者：黃 俊 傑

出版者：臺灣學生書局

本書局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一〇〇號

發行人：丁 文 治

發行所：臺灣學生書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戶〇〇〇二四六六八號
電話：三三二五・三三三七・三三〇七

定價 精裝新臺幣二五〇元
平裝新臺幣二〇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月增訂三版

誌 謝

本書編譯各篇論文，均由出版者臺灣學生書局與原出版者洽商，獲得以下各出版社授予中文之翻譯出版權：史丹福大學出版社（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觀念史學報（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編輯部、加州大學出版社（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芝加哥大學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自由出版社（Free Press）等。特此聲明。

本書第六篇：「布勞岱與韋伯：歷史對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的意義」原係東海大學高承恕教授於民國七十年五月廿九日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之「『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社會學』研討會」所提出之論文，此文將收入「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乙種第十號，本書編者承高教授及民族學研究所所長文崇一教授同意，收錄此文於本書之中，謹申謝意。

從方法論立場論歷史學與社會學之關係

增訂再版代序

一、

自中西史學傳統發展之經驗觀之，不僅人類歷史意識之發達與時代之變化相表裏，歷史學整體之進展亦與世變相推移。史學研究固受時代之刺激而得以拓展其視野，通貫其脈絡；然史學之智慧亦轉而批導其時代，針砭時代之沉疴。職是，史學與時代之間動態之辯證性關係乃使古今不截然斷為兩極，而千年如會於一堂也。就古代史學發展之事實言之，春秋晚委，周道衰廢，「王者之迹息」，世變日亟，於是乃有「春秋」之撰作（註一），此時代對史學研究之刺激也；然史家亦欲通過史著以提昇時代，以「春秋」一書完成其「是非二百四十

註一：孟子（四部備要本），卷四，離婁下，頁十八，上半頁—十九，下半頁。

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之理想（註二）。古希臘史家修西的底斯（Thucydides, 346-400 B.C.）目睹公元前五世紀雅典與斯巴達之內訌，身預歷時卅載波及希臘各邦之帕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 431-404 B.C.），乃有所感動於心，撰述「帕羅奔尼撒戰爭史」以垂諸久遠以爲教訓。

近代以來，史學研究尤與世變桴鼓相應，交光互影。十九世紀歐西史學界樂觀氣氛之所以大爲瀾漫，史學家對「科學史學」（"scientific history"）信持之所以若是其誠篤，遠之固自西洋思想傳統中源遠流長之「進步觀念」汲取其泉源（註三），近之則與十九世紀以降科學主義大興之時代背景相表裏也。洎乎二十世紀，則學風漸變，一方面歷史主義（Historicism）所引起的危機諸如歷史相對性之問題、歷史學方法之問題及國家與權力使用之問題等逐漸暴露，史學家特羅慈（Ernst Troeltsch, 1865-1923）、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及邁乃克（Friedrich Meinecke, 1862-1954）等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就已開始反省歷史主義之問題及其內蘊之危機（註四）。然對十九世紀以降歐陸歷史主義之史學傳統最

註二：史記（臺北：泰順書局影印新校標點本），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七十，頁三二九七。

註三：參考：Robert Nisbet, *History of the Idea of Progress*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70)

註四：關於這個問題，參考：李弘祺，「歷史主義的危機與超越——現代西洋史學之危機」，*史學評論*，第一期（民國六十八年七月），頁四一—七一。

具摧毀力之因素仍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世局之變化。戰爭期間，人類史上所見最殘酷之屠殺一再重現，納粹在歐洲各地肆行殺戮，猶太人集體慘死於瓦斯毒氣室，日本軍閥殘殺中國同胞，毀滅性的原子彈初次投擲於廣島及長崎，凡此種種皆刺激史家反省歷史主義傳統中所蘊涵之價值多元觀，方法論之主觀性及國家權力之濫用等問題。此種時代變局之背景，係英國史學家巴特菲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與柏林（Isaiah Berlin）爭辯歷史研究中道德判斷問題之現實原因，亦為柏林教授力持歷史研究必談價值、捨價值無史學之根本理由（註五）。

在此種世局變化的時代背景之下，史學研究之風氣亦為之不變。吾人細按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近三十年來歐美史學研究大勢似不出以下二大趨勢：一是「定論歷史」（Ultimate History）信念之揚棄：十九世紀史家意氣昂揚，充滿自信，顧盼自雄，深信史料一旦蒐集齊全即可舉起如椽巨筆寫下定論之歷史，法國著名史家古朗士（N. D. Fustel de Coulanges, 1830-1889）的名言：「不是我在寫歷史，而是史料通過我在陳述它自己」，英國史家伯利（J. B. Bury, 1861-1927）所謂「歷史是科學，不多也不少」（"History is science,

註五：關於兩氏之論點，皆收入：Hans Meyerhoff ed.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Our Time*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1969), pp. 228-272.

no more and no less”)皆爲此種樂觀信心之反映。然人類歷經二次大戰之浩劫之後，此種「科學史學」之信念乃爲之動搖，戰後歐美史家一面上承三〇年代歷史相對論者不滿科學史學之餘緒，一面又在變幻世局的打擊之下哀聲悲嘆，展望前景一片蒼茫。最能反映戰前及戰後此種物換星移之轉變者殆爲英國所出版「劍橋近代史」(*Cambridge Modern History*)及「新劍橋近代史」(*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編者所撰之編輯旨趣書。「劍橋近代史」於一九〇二年至一九一二年編輯出版，由著名史學家艾克頓(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Acton, 1834-1902)主持編輯事宜。艾克頓師事德國史學家杜靈傑(Ignaz Dollinger)七年之久，把十九世紀德國史學界注重第一手史料之研究方法引入英國，並開始把英美及歐陸之歷史發展視爲一不可分之整體，在歐洲史學史上有其不可磨滅之地位。艾氏承十九世紀科學史學之餘緒，深信「定論歷史」之可能性，艾氏在其以「劍橋近代史」總編輯身份致各論文撰寫人之信函(“Letter to Contributors to 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中即申明此一信念(註六)。而最足以體現其史學思想者殆爲以下一段

註六：見 Lord Acton, “Letter to Contributors to 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n his *Essays in the Liber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William H. McNeill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pp. 396-399. 關於艾克頓爵士之生平及學術，參考 William H. McNeill 所著之傳論。

演講辭（註七）：

在幾年之內，所有的這些著作都將定稿，而我們所能知道的一切也就昭然若揭了。

……

「劍橋近代史」即爲此一樂觀信念下之產物。然此種樂觀之意氣經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浩劫而爲之消逝殆盡。一九五七年，克拉克（Sir George Clark）主持「新劍橋近代史」的編輯計劃，即宣稱：（註八）

後世的史學家……將會預期他們的著作必須一代代地被超越。他們認為，我們關於過去的知識是經由一個或幾個人的心靈所傳承下來的，也經由人的心靈加以過濾，因此，（歷史知識）並沒有包含絕不可易的基本因素或非個人的因素。……因為一切

註七：見 Lord Acton, *Lecture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Macmillan & Co, 1925), p. 373.
註八：見 Sir George Clark 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7-1970), pp. XXIV-XXV.

的歷史判斷都包含有個人因素及觀點，不相上下，所以並沒有「客觀的」歷史真理。

克拉克此語較之艾克頓之言可謂相去不啻萬里，其間之差異最可透露戰後歐陸史學研究之轉向也。（註九）

戰後史家對「定論歷史」信念之拋棄不僅以歐陸史學界爲然，亞洲之日本史學界亦有類似之發展。論者嘗指出，戰後日本史學研究之最大特徵乃在於對「實證主義史學」傳統之批判，此種批評潮流與史家對天皇體制之批評相伴而行，代表戰後日本史學界之反省。（註一〇）我國史學界近年來對於近代中國史學追求科學化之兩大途徑——「史料學派」與「史觀學派」——的反省亦與戰後世界史學界一般動態相呼應。（註一一）

註九：關於此一問題之全面性討論，可參看：Geoffrey Barraclough, *Main Trends in History* (New York & London: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Inc., 1979), pp. 5-10.

註一〇：關於這一點，參考：遠山茂樹，戰後的歷史學と歷史意識（東京：岩波書店，一九六八—一九七九），頁七—十二。

註一一：參考：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六十五年），「自序」，頁九—十三；氏著，「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代『發刊辭』」，*史學評論*，第一期（民國六十八年七月），頁一—二十四。

戰後世界史學研究的第二個大趨勢是史學研究領域的擴大。二次大戰後，世界各地之交互影響之程度與日俱增，而全世界社會政治秩序的重整與自由傳統的備受挑戰都使史學家努力於尋求新的治史觀念與史學方法。另一方面，德國歷史主義的沒落也使更多史學家注意到政治史以外諸如經濟、社會、文化、思想乃至心理的層次。這種戰後史學要求擴大其研究領域的動向就促成了近三十年來史學與社會科學兩者間的密切合作，尤以美國史學界為然。美國思想中原有一種實驗主義之傳統，此表現而為以史學為政治改革工具之信念。戰後史學與社會科學之結合更在史學界引起了一場寇克蘭(Thomas C. Cochran, 1902-)所謂之「內在革命」(Inner revolution)，洵至經濟史幾已獨立於一般史學研究範圍之外，而未受社會學訓練之史家亦不敢輕言社會史矣。

歐陸之史學則可以一九五五年為其分水嶺。自是年起，所謂「年鑑學派」(Annales School，其學報創刊於一九二九年)之史學透過白勞岱(Fernand Braudel, 1902-)等人之領導開始對史學研究產生可觀的影響(註一二)。在此種研究領域的拓展之下，史學研究的

註一二：以上有關戰後歐美史學之一般討論，參看：Geoffrey BanacloUGH, *op. cit.*, pp. 45-93；李弘祺，「從社會科學到社會整體歷史——現代西洋史學之危機」，*史學評論*，第三期（民國七十年三月），頁二九—七八。

重點從以前注重個人逐漸轉移到社會，而研究方法也從以前的注重定性分析逐漸轉而講求定量分析。

在史學與社會科學結合的戰後研究趨勢之中，社會學與史學的關係是吾人極應重視的一環。誠如英國史學家厄爾頓 (G. R. Elton) 所云，社會學教導史學家對舊史料及舊史實提出新問題 (註一三)，近三十年來社會學對歐美史學界造成重大之衝擊，其餘波流風所及，中國史學家深深感受到社會科學對史學之挑戰。舉例言之，吾國史學界前輩張蔭麟 (一九〇五—一九四二、十、廿四) 即嘗與友人論志趣云：「國史為弟志業，年來治哲學治社會學，無非為此種工作之預備。從哲學冀得超放之博觀，與方法之自覺，從社會學冀明人事之理法」 (註一四)，張氏冀求會通史學與社會學之心願躍然紙上。弁潤孫亦云：「我國今後史學發展，必當以社會科學為基礎，始克躋諸世界史學之林」 (註一五)，其言頗能反映吾國史學所受到的社會科學之壓力感。此種壓力感與時俱增，無日或已，張玉法教授近日嘗著文為

註一三：見：G. R. Elton, *The Practice of History* (London: Methuen, 1967), p. 24.

註一四：張氏致張其昀函。見：張其昀，「張蔭麟先生的史學」，收入：張蔭麟文集 (臺北：中華書局委員會，民國四十五年)，頁一。

註一五：弁潤孫，「祀所見之二十五年來史學著作」，收入：杜維運、黃道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 (臺北：華世出版社，民國六十五年)，頁一一四九。

「史學將沒有生存的餘地」之現象而憂心忡忡云（註一六）：

各類科學都在無限擴張其範圍，尤其是社會科學的擴張，對史學的威脅極大，史學家如不振作，史學將有被瓜分的可能，有價值的史學著作將為政治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甚至統計學家、心理學家所寫的歷史，史學家將只是「東抄西湊」的人，而史學也就變成了雜燴！

此類言論皆涉及史學與社會學之關係，此為今日吾國史學界所面臨的一項重大問題，亟待吾人深思。

二

中國知識界之知有社會科學當在十九世紀西學東漸之時，然其知之也漸，非一蹴而幾。據近人研究，十九世紀下半葉中國知識界共翻譯西洋書籍五六七種，其中百分之四十屬於自

註一六：張玉法，「史學革命論」，收入：氏著，歷史學的新領域（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六十八年），頁一五五。

然科學領域，屬社會科學者僅佔百分之八（註一七）。中國知識界真正開始正視社會科學之重要性當自甲午之戰（一八九五年）以後，甲午之役日本以蕞爾小島一舉擊敗大清帝國，此一刺激使中國知識份子心神之所關注從堅船利砲轉向政法制度，康梁變法於焉出現，而社會法政諸學亦一併而獲國人之注意。一八九八年，嚴復（又陵，一八五三——一九二一）始譯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之 *A Study of Sociology* (1883) 為中文，顏之曰：「羣學肆言」，越四年，全書竣事，嚴幾道譯此書有其以天演原則詮釋社會進化原理之用心（註一八），此為中國學界正式譯介西方社會學之始。

近代吾國史學界對歷史學與社會學關係之反省當自梁啟超（一八七六——一九二九）始。清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任公發表「新史學」乙文，此文極可反映二十世紀初年中國新史學啓蒙時期中國人不滿傳統史學之一般情緒。此年亦為任公流亡日本之第三年，

註一七：參考 Tsuen-hsiung Tsien, "Western Impact on China through Translations," *Far Eastern Quarterly*, XIII:3 (May, 1954), pp. 305-327.

註一八：參考：郭廷以，「近代科學與民主思想的輸入——晚清譯書與西學」，大陸雜誌第四卷第一期，收入：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一冊，史學通論（臺北：大陸雜誌社，無出版日期），頁一〇二——一一；Benjamin I.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開始公開放棄前此所持立孔教以爲國教之主張，並力倡新民之說，主張重公德而求羣體之利益。在此種思想背景之下，任公回顧傳統中國史學，乃激憤不滿之情流露於筆端。任公一面欣羨於「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文明所以日進，史學之功居其半焉」（註一九），一面則指出傳統中國史學知識未能普及於國民之四大病源：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二曰知個人而不知有羣體；三曰知有陳迹而不知有今務；四曰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繼又指出中國史學緣此四蔽後生二病：一曰能鋪敘而不能別裁；二曰能因襲而不能創作（註二〇）。職是，任公乃一如其欲一新國民之德行而提出新民說，在此提出「新史學」之主張，並以「新史氏」自命。任公爲新史學所下之定義有三：（一）、歷史者敘述進化之現象也；（二）、歷史者敘述人羣進化之現象也；（三）、歷史者敘述人羣之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註二一）。任公又爲新史學下一總定義云：「歷史者何？敘人種之發達與其競爭而已，舍人種則無歷史。」（註二二）任公對歷史所下之定義沾有極其濃厚的達爾文（C. G. Darwin, 1809-1882）

註一九：見：梁啟超，「新史學」，收入：杜維運、黃俊傑編，史學方法論文選集（臺北華世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十月增訂再版），頁三三。

註二〇：同上書，頁三五—三八。

註二一：同上書，頁三九—四三。

註二二：同上書，頁四四。

進化論之色彩，此種歷史進化論乃西方近代史學之首先輸入中國者（註二三），任公生逢其會，其言論乃不知不覺受進化論之影響也。任公所倡「新史學」之言論中實已蘊涵有社會學之眼光，頗能開風氣之先。

任公之後，介紹社會學入中國史學界者當推何炳松。在何氏之前，劉師培（申叔，一八八四、五、二——一九一九、十一、廿）嘗撰文論小學與社會學之關係（註二四），然影響似不深遠。就學術史立場言，何氏是近代中國史學界中輸入西洋治史方法之一重要人物。彼於民國九年在北京大學史學系講授「歷史研究法」一課，此或為國內大學設置此一課程之為時最早者。何氏嘗於民國十年譯美國史家魯賓孫（J. H. Robinson, 1863-1936）之「新史學」（*The New History*）一書為中文，此為吾國史學界所譯有關西洋史學理論及方法論之第一部著作，歷史意義至為重大。中國史學界之注重史學與社會科學關係受此書影響甚大。何氏雖倡魯賓孫之「新史學」，然其在社會學與史學之關係一節多側重其相異面。何氏之言曰（註二五）：

註二三：參考：杜維運師，「西方史學輸入中國考」，「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三期（民國六十五年五月），頁四一四—四一五。

註二四：見：劉師培，「左盦外集」，收入：劉申叔先生遺書（臺北：京華書局影印本），頁一六七〇—一六八〇。
註二五：見：何炳松，「歷史研究法」，收入：杜維運、黃俊傑編，「史學方法論文選集」，頁七三—七四。

至於史學與社會學雖同以已往之人羣事跡，為研究之根據；然目的方法，既然各不相同，研究結果，亦復迥然有別。史家抉擇事實，旨在求異。所取方法，重在溯源。其結果非人類共同演化之原理，乃人類複雜演化之渾淪。至於社會學所致意者乃已往人羣事跡之相同。參互推求，藉以發見駕馭人羣活動之通則。選擇事實，務求其同，不求其異。所得結果，非人類演化之渾淪，乃人羣活動之定律。故社會學為研究社會之自然科學，其所取方法，與史學異，而與自然科學同。總之，史學所重者在質，社會學所重者在量。史學所求者為往跡之異，社會學所求者為往跡之同。兩者功用，足以相資，而流別分明，不能相混。此學者所宜明辨者也。

何氏這一段言論頗能代表民國以來吾國史學界一部份人士對史學與社會學關係之看法，故請自何氏所云此兩種學科之差異點說起。

通說以後歷史學與社會學的重大差異不外以下二節：一是史學研究所注重者在於人類活動之發展順序及其過程，而社會學研究則探討人類活動發展之型態及其轉變。前者重其縱剖面的連續，其關心之焦點在事件之「變」與「常」；後者重橫切面之比較，其關心之焦點在